

● 中国文学

李渔曲学价值观略论

陈 顺 智

(武汉大学 留学生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顺智(1957-), 男, 湖北石首人, 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摘 要] 李渔以“成名”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 通过对“技无大小, 贵在能精”、“才乏纤洪, 利于善用”这一论断的剖析, 深刻反映了其多元价值观与对精品意识和非凡价值的倡导; 他由此充分肯定了作为“破道之小言”的戏曲享有与“经国之大业”同等的价值与地位。

[关键词] 李渔; 曲学; 价值观;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4-0476-05

价值作为一种哲学学说, 主要是从主体如何满足与能否满足入手来考察与评价物质与精神的活动对于人、阶层、社会的意义。价值观与人的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李渔的价值观在其曲学思想之中占有核心和主导地位。因此, 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李渔的曲学思想, 就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李渔的价值观。

—

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之“结构第一”开篇即说:

吾谓技无大小, 贵在能精; 才乏纤洪, 利于善用; 能精善用, 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1] (第1页)

这一句话的中心意义在于“成名”, 换言之, 李渔是以成名作为人生价值准则的。在如何成名与怎样成名方面, 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技无大小”而言, 他谈论的是技巧技术层面的问题, 或者说是职业的问题; 就“才乏纤洪”而言, 他谈论的是主体层面的问题, 或者说是作者先天的问题。两个层面都要涉及主客体, 但各有侧重点, 前者是说由客体可以上升到主体, 后者是说由主体必须落实到客体。

所谓“技无大小, 贵在能精”, 正是庄子“技进乎道”思想的表现。《庄子·天地》中说:“通于天地者德也, 行于万物者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 事兼于义, 义兼于德, 德兼于道, 道兼于天。”对这种技进乎道、技道相通的思想, 庄子借助了许多事例加以说明, 例如《天道篇》中的轮扁斫轮“不徐不疾”, “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 “口不能言, 有数存焉其间”; 如《达生篇》中所写的佝偻承蜩之身“若厥株拘”、臂“若槁木之枝”, 完全达到了“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心与蜩的合一、手(技)与心的合一, 蜩、手、心三者的合一, 由外而内, 乃造于“有道”之境; 还有一个极著名的例子, 那就是《养生主》中描绘的庖丁, 他解剖牛体时, “依乎天理”“因其自然”而能够达到“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 就更是由技进乎道了。由上可知, 技之是否精湛即在于能否进之于道, 换言之, 技之由粗而精的过程正是由技而道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即是由物——手——心、由客体向主体不断深化、不断内化的过程。由此理解李渔的“技无大小, 贵在能精”, 可知他意在强调技无重要不重要的分别, 而在于能不能精。“技”只要能精, 便能进于道。如

果将李渔的这所谓“技”理解为百行职业，那么他所强调的则是职业贵贱，只要能精也能有所成就。这透露出他百业平等、均有作为的思想意识。如果联系其生平事迹，那么他之所以有着如此的思想观念，或许缘于他科名不成，又从事“文人之末技”的“填词一道”所致吧。

所谓“才乏纤洪，利于善用”，正是郭象“物各有性”、万物逍遥思想的体现。郭象万物独化的哲学认为，万物的存在依据以及存在方式就在于万有的“自性”，故曰“物各有性，性各有极”^[2]（第11页）；物各有性，人也各有性，万物之性受之于天，人之才能也由禀赋而定，而且这种天赋才性，既无法改变，也无法增益减损：“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2]（第128页）人之才性，正因为有偏通之分、大小之别、长短之异，所以每个人不要“以圆学方，以鱼慕鸟”，只要“止乎本性”，而不“求外无已”，亦即知足知止，足于自性、止于自性，并充分发挥自性与才能而造于极至，同样可以获得成功。反此，要么是“学弥得而性弥失”，要么是“疲役终身”，“成功者无时可见也”。郭象在《庄子·逍遥游》注中说，“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鸟兽万物，各足于所受；帝尧许由，各静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实也。各得其实，又何所为乎哉？自得而已矣。”虽然厨师和祭司职业不同，飞禽与走兽能力有异，皇帝和隐士地位悬绝，只要他们都能安于职守，足于禀分，静于际遇，也就满足了各自的性分。一旦如此，不仅能得到“自性”，得到“天下之至实”，从而达到了人生的快乐至境，而且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从而在自己有限的才能范围之内获得最大的成功。郭象还由此出发，重新阐释了庄子“逍遥”的含义，认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的神人至人固然可以“逍遥”，即使是斥鴳、大鹏也同样可以顺其“自性”而逍遥。他们在“逍遥”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区别。

李渔之所以运用庄子与郭象的思想，是为了说明和论证自己从事的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与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里，李渔的最高价值准则是“成名”与否，因为不管技之大小与才之纤洪，只要技艺精湛、善用才能，即使“寸长尺短”也终能“成名”。

既然李渔认为“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又既然他将“成名”作为最高准则，那么才之大小与业之百行就自然成为实现其价值而通向“成名”的途径，这就必然要求“才”与“技”结合。对于成名而言，仅有才华不行，仅能善用也不行，“善用”与“能精”二者必须有机结合统一起来，才能创作出“成名”的作品。“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著书惟供覆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李渔举例说，就个人而言，如汤显祖诗文词曲之作甚多，可是令其“成名”的主要是戏剧《牡丹亭》；就时代而言，如有宋一代，作品种类甚多，有诗文词小说等，可是堪称独步、令人赞不绝口的只有“宋词”。不难看出，在李渔“成名”准则之中包含着精品意识。

二

“成名”固然是李渔的最高价值准则，但是他所说的“成名”，与传统文化中所谓“三不朽”的思想有同又有异，与曹丕的“经国之大业”的思想认识也不完全相等。这可以从其友人余怀对《闲情偶寄》的评价中看出。余怀在《闲情偶寄序》中说：“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从世人这种非议之中，不难看出李渔思想与世俗思想的差异。

在李渔的价值观中，道德的、政治的、伦理的一些外在因素被大大地淡化了。这在当时程朱理学盛行的背景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受到的非议也可想而知。惟其如此，当时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世之腐儒”们便强烈批评李渔“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出于对朋友的深刻理解，余怀顶着强大的社会压力，给予了李渔有力的支持。余怀列举了东晋谢安石、唐代白香山、韩愈与宋代苏东坡的事迹，说尽管他们有着风流倜傥的一面，可不妨碍他们成就“经国之大业”：

故古来能建大勋业、作真文章者，必有超绝世俗之情，磊落嶷嶷之韵，如文靖诸公是也。今

李子以雅淡之才，巧妙之思，经营惨淡，缔造详周，即经国之大业，何遽不在是？而岂破道之小言也哉！^[1]（第1页）

余怀与李渔曲学思想的出发点以及他们与“腐儒”争论的焦点，均在于“经国之大业”与“破道之小言”的

价值,传奇与曲学是否为“破道之小言”?纵观中国文学思想史,先秦时代提出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的“立言”主要是泛指著书立说,由此确立了文字著述的崇高地位。到了曹魏时代,曹丕《典论·论文》中更明确地得出“文章”的特殊地位:“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首次将文章的地位提升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可是,由于戏曲晚出,不包含在这“文章”之中,未能进入“经国大业”之列,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小道”。即使那些戏曲作家与曲论家也同样未能摆脱这一传统的价值观。金圣叹以拔山扛鼎之力、精湛独到之眼对被一般封建文人称为“诲淫诲盗”的《西厢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天地妙文”,将其与《诗经》、《庄子》、《楚辞》、《左传》、《国策》、《史记》、《汉书》、杜诗、韩、柳、三苏等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但是,金圣叹还没有从总体上认识戏曲的价值,也还没有明确表述《西厢记》“经国之大业”的价值与地位。李渔则更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作为文体之一类的戏曲的价值及其“经国之大业”的意义。

传奇之所以与史传诗文具有同等的价值,是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本质特征。李渔说:

王道本乎人情,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无论词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五经》、《四书》、《左》、《国》、《史》、《汉》,以及唐宋诸大家,何一不说人情?何一不关物理?及今家传户颂,有怪其平易而废之者乎?^[2](第12页)

李渔将传奇与《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相提并论,是将传奇置于“王道”这一层面。他甚至认为传奇就是三代之《韶》《濩》:“吾谓剧本非他,即三代以后之《韶》《濩》也。”传奇有着如此重要的价值,创作不是“经国之大业”还能是什么?传奇本于“王道”,又怎能说是“破道之小言”!

即使以其“成名”的价值观而论,传奇创作也可以使人成名,作用是巨大的。由“成名”的价值准则出发,李渔考察了“帝王国事,以填词而得名者”:

填词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遂能不泯其国事者。……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踰踰,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即语言文字之末,图书翰墨之微,亦少概见;使非崇尚词曲,得《琵琶》《西厢》以及《元人百种》诸书传于后代,则当日之元亦与五代、金、辽同其泯灭,焉能附三朝骥尾,而挂学士之齿颊哉?^[1](第2页)

李渔历数了前代以戏曲名世的名人:

高则诚、王实甫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词一无表见;使两人不撰《琵琶》、《西厢》,则沿至今日,谁复知其姓字?是则诚、实甫之传,《琵琶》、《西厢》之传也。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之传也。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1](第1-2页)

这些都是以填词而得名的显著例子。词曲传奇可以使一个作家名垂青史,可以令一个王朝不泯于世,这还能说它是“破道之小言”而非“经国之大业”吗?

作为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拥护者,李渔不排斥“经国之大业”,也不否定“破道之小言”。他比那些高谈仁义道德和政治功业者的胸襟要豁达得多。他没有因为一己之好,便去否认别人所从事事业的意义,而只是希望自己的爱好能够得到承认与尊重。

三

李渔之所以从“技无大小,贵在能精”与“才乏纤洪,利于善用”的价值取向方面来标举其“成名”的价值观,是与他的身世际遇和戏曲在当时的地位分不开的。

从个人身世经历来看,李渔并非如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一般士子一样热衷于科举功名。他自少遍游四方,足迹遍及苏、皖、赣、闽、粤、鄂、豫、陕、甘、晋、北京等地,41岁去杭州,后移家金陵,游历四方,广交名士。康熙十六年(1677)复自南京移家杭州,于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自号湖上笠翁。终其一生,他仅于明崇祯十年(1637)以秀才考入金华府,入清之后便不再应试。在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自始至终均是以科名为第一选择,即使无意于仕途,也是事出有因。李渔无意于仕途,不外乎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仕途淹蹇坎坷,二是不满官场行为,三是天下多故而绝意仕途,四是当时文化繁荣为文人的专心致力于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使得文人能够摈弃科名,五是可能当时的城市商业的发展,为文人一面经商一面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文化活动提供了条件。无论出于何因,均为李渔多元化的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基础。虽然在李渔之前的知识分子也曾有过不仕则隐的双向价值观念,但到底“隐”这种价值观仍然是以出仕为参考背景、为核心、为基础的。然而,李渔在思考人生价值时,抛弃了传统的致仕为官的价值体系与背景,提出了“技无大小,贵在能精”、百行百业并行不悖,“才乏纤洪,利于善用”、才无三等、无多无少的多元价值论,充分肯定了人尽其才、业在于精的平等价值取向。李渔流露出的潜意识也是明白的,那就是自己没有科名,所以要充分证明没有科名者照样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不朽”。这仅仅是从个人意义上而言。若从社会时代方面而论,李渔的多元价值论与平等价值取向的意义则显得更为重大。

李渔商业化的生活实际也为他多元化的价值观与“成名”价值准则奠定了现实的基础。明代中期以后,工商手工业逐渐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市民文化日趋独立。李贽在《答邓石阳》中即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无论贵贱贫富。这既为商业的存在作出理论铺垫,又为人生价值的多元化选择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晚明清初浓厚的商业化氛围中,李渔的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商业化倾向,如其戏曲创作是出于“砚田糊口”的需要。他还创作了《无声戏》、《连城壁全集》、《十二楼》、《合锦回文传》、《肉蒲团》一类才子佳人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低级庸俗的小说。李渔在金陵时,还从事书商活动,开设有芥子书铺,刻售图书。李渔的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人编的《芥子园画谱》,流传甚广。李渔以乔姬、王姬与黄姬等人为骨干组成的家庭戏班,曾有过一些商业演出或者说是类似于商业演出的活动。他虽然不十分乐意,终究还是将家班拉出家门,走向江湖。当时居住在苏州的著名戏曲家尤侗《梅庵年谱》中记叙道:“金陵李笠翁(渔)至苏,携女乐一部,声色双丽,招予寓斋顾曲相乐也。予与余澹心(怀)赋诗赠之,以当缠头。”

李渔的生活情调体现了快乐人生的文化品格,既非那种纯粹感官享乐性的人生意趣,亦非那种道家般枯淡寡味的人生理念。从前述李渔价值观的渊源上看,与其说他是体现了儒家以道自任的人生哲学,不如说是体现了发源于庄子成熟于郭象一派的逍遥自在的人生哲学。他的曲学思想很多得益于金圣叹。而金圣叹也是一位懂得享受与快乐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评点“四大才子书”的同时,也在洞悉并品味着人生的乐趣,并于绵绵阴雨中数着人生的三十三则“不亦快哉”!王阳明心学左派所开启的自由精神与快乐心灵,在晚明清初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都市生活的繁荣而渗入了知识分子心中。这种快乐的精神也深深体现在《闲情偶寄》一书中,余怀在《闲情偶寄序》中谈了自己的读后感:

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闲。谬谬乎,纚纚乎,读者读之旷,僇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忤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1](第1页)

对于李渔的价值观及其意义,余怀的赞扬是不遗余力的,甚至用了钟嵘《诗品》中赞扬阮籍的一些颂辞,但有所增益。增益的部分,谈的是李渔《闲情偶寄》的独特效果——使人“旷”、使人“通”、使人“愉”、使人“巧”、还使人“忤且舞”、“霍然兴”。这些效果,从内容来看,主要属于个人内心生活方面的思想情感范

畴,而不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政治道德范围;从性质来看,这些情感基本上属于使人愉悦高兴的正面情感,而不是令人沮丧低沉的负面情感。简言之,李渔《闲情偶寄》一书正是诉诸读者的内心生活与感情享受,所欲达到的目标也正是多元化的人生、愉悦的人生、情感化的人生。对于李渔深藏于言辞之中而又极力传达的这种多元化、娱悦性的人生价值观的认识,余怀切中肯綮。

李渔追求愉悦的人生态度,从《闲情偶寄》的后半部,即“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中不难看出。谈教女子学词曲的一部分最有代表性,他说:

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义,皆可教职工作诗余。盖长短句法,日日见于词曲之中,入者既多,出者自易,较作诗之功尤捷也。曲体最长,每一套必须数曲,非力赡者不能;诗余短而易竞,如《长相思》、《浣溪沙》、《如梦令》、《蝶恋花》之类,每首不过一二十字,作之可逗灵机,但观诗余选本,多闺秀女郎之作,为其词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诗余既熟,即可由短而长,扩为词曲,其势亦易。果能如是,听其自制自歌,则名士佳人合而为一,千古来韵事韵人,未有出于此者。

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乐,咸欲谪向人寰而就之矣。^[1](第 134-135 页)

欣赏女子“自制自歌”固然令人愉悦,然而“名士佳人合而为一”更是美妙无比,难怪李渔要说“千古来韵事韵人,未有出于此者”了。余怀评道:“世有享此福者,只宜多叫笠翁!”余怀不愧为李渔挚友,对他追求愉悦、享乐的人生态度非常了解。

总前所述,李渔的价值观是以“成名”作为最高准则的,但其“成名”并不单纯以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为目的,因而内涵更为宽泛;在如何“成名”的途径和方式上,李渔认同的是“能精善用”的多元化价值选择,这一方面不同于将百行百业判出高下贵贱的传统价值观,另方面也体现了明代中晚叶后“满街皆圣人”、“人人是佛”以及“人人皆可以为圣”的思想潮流。既然戏曲能够助人“成名”、既然创作戏曲与高中科举、成就功德并无二致,那么戏曲的价值与创作戏曲的意义也就自然不言而喻了。

[参 考 文 献]

[1] 李 渔. 闲情偶寄[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 郭 象. 庄子集释[Z].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黄果泉. 李渔家庭戏班综论[J]. 南开学报, 2000, (2).

(责任编辑 何良昊)

A Brief Comment about LI Yu's Idea of Poetic Drama Writing

CHEN Shun-zhi

(Education College for Foreign Studen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Shun-zhi (1957-), male, Doctor of philosophy, Professor, Education College for Foreign Student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ancient times.

Abstract: LI Yu took “to become famous” as the core of his values. His analysis of “technique doesn't varied in size, but lies in fine” “no matter high or low, ability needs to be used properly” profoundly reflected his multiplication values and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high-quality works awareness and the outstanding value. And from these, he had fully affirmed the drama of “the slightly verse of telling truth” shared the same value with the status of “great undertaking of manage a country”.

Key words: LI Yu; idea of poetic drama writing; value; multiplication